

G 特稿 119

长在土地上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亮



甘肃省西和县蒿林乡地处山区,是甘肃省40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到2019年,该乡12个行政村有9个实现整村脱贫。

本报记者 王伟伟



《出山记》一开始,申周(右一)一家在深山中的家门口吃饭。受访者供图



目前,甘肃西和县通过发展辣椒育苗、栽植和蔬菜种植产业解决贫困问题。9月4日,一名农民正在日光棚里晾晒辣椒。本报记者 王伟伟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柏果树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儿童在打乒乓球。本报记者 雷宇翔

是闹出事故来了,谁能负责?”

2015年,焦波收到一位年轻影迷转发的微信文章,大致内容是中国将有7000万贫困人口走出“大山”。焦波看后心里一惊,决定要拍下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开展的脱贫攻坚工作。

《出山记》由此而来。

位于大山深处,在大漆村常常能见到云雾缭绕的景象。“我现在的处境就像眼前的迷雾一样看不清。”在拍摄前期走访时,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申周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让焦波眼前一亮。

如此“格格不入”的场景,在《乡村里的中国》里也出现过。

纪录片拍摄那年,几乎没有声乐基础的杜深忠花近700元买了一把琵琶,却跟老伴儿说只花

战线上的人

经过申修军反复做工作,申学王和妻子终于转变了态度。2017年秋天,申家三口搬进了务川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今天是我们最好的日子,要感谢你。”申学王对前来帮忙搬家的申修军说。

在焦波的每一部农村纪录片里,村干部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出山记》中,申修军只有3个在家的场景,除此以外,他每一次出现在镜头中,都是因为有问题需要他解决。

石朝乡修修大道,沿途要拆除大漆村13栋居住房,申修军要到每一户家中做工作。悬崖上的泉里组是搬还是留,留下来的话怎么通公路,为此申修军跑了一趟又一趟。精准识别后,没成为贫困户的人有的去堵路,有的扯烂申修军的衣服,打得他全身多处“挂彩”。

即使回到家,申修军也还要面对妻子对他“不顾家”的数落与埋怨。平日对待最激动的村民都游刃有余的申修军,这时却讲不出让人信服的道理。

为了给村里引入资金发展乡村旅游,杓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自恩四处奔忙,但个别村民老是以“查账”为名找他的麻烦。面对无休止的审核,他气急败坏地说:“大不写了辞职,辞职不干了。”

在日渐富裕的丁楼村,村支书任庆生日子同样不好过。大集镇希望把村里的网店统一搬到镇里的电商产业园,村民想在自家责任田上建厂房。任庆生多方协调,却落得里外不是人,上级认为他开展工作不力,邻里间则说他丁楼村的“叛徒”。

有观众质疑,这些画面是否在刻意美化基层干部,焦波却认为,基层干部当然有不同的横切面,但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绝不可忽视。“尤其是在脱贫攻坚期间,他们是真正将双脚踏在战线上的群体。”

在跟拍申修军期间,有一次摄制组夜里走进他办公室,正好拍到他一边打点滴一边填写当天要上报各级部门的各种材料,“白天处理各种事,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填表,经常要填到凌晨。”

这段画面没有被放在成片中,因为团队担心把申修军拍得太苦,“观众会觉得假假”。

张自恩最终没有“写辞职”,上级部门介入后,不实举报的事得到妥善解决。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杓峪村的党支部书记。

一直以来,杓峪村既不是贫困庄户也不是富裕农村,它就像传统中国农村典型的代表,既沐浴着时代的风雨,又似乎总是在原地静止着。

《乡村里的中国》拍摄8年后,除了多了零星几家民宿和农家乐,被张自恩寄予厚望的旅游产业并没有让杓峪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种苹果,依然像过去多年一样,是村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能直播卖果子了。”张自恩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庄镇镇长为村里的苹果代言,一场直播卖出了不少库存。

为了下一代

《出山记》以申周一家在老屋吃饭开头,以搬迁后在新房吃饭收尾。“出山”后这家人的生活,成了留给观众的一个谜。

谜底并不算美好。因为不习惯也负担不起城里样样要花钱的生活,申学王和妻子一度隔一阵就回到山里,在曾经老屋所在的位置搭个临时帐篷养鸡养鸭。后来,当地政府给申母安排了一个保洁员的工作,再加上申学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夫妻俩慢慢不再往回跑。

但申母依然在安置房附近找了一块地,除了冬天,家里的菜都从地里出。她说,这样就可以补贴家用,也能打发时间。

把搬迁视作救命稻草的申周没能如愿。他不满足于政府安排的流水线工作,限于学历又很难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几经辗转,如今他还在务川周边的工地上做着零工。“住房条件改善了,可怎么成为城里人,我还没想到办法。”

至于他的亲事,依然没有眉目。

移民搬迁可以很快,但搬迁之后的磨合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云南,焦波团队记录了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村落老窝村搬迁前后的场景。由于地处边陲,交通极为闭塞,老窝村1400人所过的生活几乎是任何一个现代人都难以想象出的贫困与落后。

面对镜头,15岁的初中辍学生邓志花说:“老天爷怎么让我出生在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没让我在外面出生。”

“为了下一代”,几乎是每个易地扶贫移民搬迁户最深层的动力。

《乡村里的中国》上映后,杜深忠“红”了好一阵。不过60岁的年纪和肚子算不上太多的墨水,让他的生活最终没有太大变化。8年过去,或许最让他欣慰的,是儿子杜海龙如他所愿,通过读书走出了农村。大学毕业后,杜海龙在北京找到工作,并正计划着在那里成家。

“杜深忠的下一代改变了命运,也许申周的下一代也能擦去眼前的迷雾。”焦波说,在老窝村的拍摄结束前,全村人从有滑坡泥石流风险的老村子搬到了新村。虽然只间隔两公里,但老窝新村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房屋,新的联通外界的公路,还有新的小学教室。

回到北京后,焦波团队剪辑出了《老窝》的样片。样片结尾,孩子们扯着嗓子朗诵《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镜头扫过那七八个孩子的脸。谁也不知道,等他们长大了,是否还有老窝村这个地名。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二维码

要联系上申周不容易——按之前约定的时间,连续好几天一遍遍拨打他的手机,始终无人应答。

等到他终于在千里之外按下接听键,通话开始的几分钟里,他都在重复一个意思:我不想接受任何采访。

2018年4月,反映贵州省极贫乡镇石朝乡脱贫攻坚进程的纪录片《出山记》上映。当年30岁的申周是片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他和自己的父母从大山中搬到了县城里的集中安置点,成为当地又一例摘帽的贫困户。

2014年底,中国尚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其后数年间,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每年都有1000多万人脱贫。这意味着,一些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农村,在最近不到十年时间里,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巨变。

在这期间,纪录片导演焦波和他的镜头始终没有离开农村。用他的话说,自己的团队是“在土地上挖故事的人”。

如今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展示给任何人的申周,和许多少年、青年、老年一样,都曾是种在土地上的故事。

离与合

对于要不要搬迁,申家曾有严重的分歧。“搬下去维持不了生活。”201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申学王坐在灶台边,一边抽烟一边用最简洁又直接的理由否决了儿子申周的提议。

“搬下去的话,鸡、鸭、猪都不能养。”申母开口支持身旁的丈夫。

屋子的另一边,申周独自坚持着要搬到务川县城的想法。年满30岁还没找到一门亲事,他觉得这和深居大山家里条件太差有很大关系。“我还想成家,想有下一代,总不能代代都像这样过。”

三个人都沉默了,只有申母用火钳摆弄着灶炉里噼啪燃烧的柴火。

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是贵州省的极贫乡镇之一,申周一家所在的石朝乡大漆村多山地,少平原,再加上石漠化严重,人均耕地面积很少,是极贫乡里的极贫村。

大漆村里,村民大多只能靠牛羊等牲畜养殖勉强糊口。因为坐落在悬崖之上,直到2016年,村中的泉里组还没有通公路,村民出山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离开大山,是申周心中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而在焦波拍摄的多部聚焦农村的纪录片里,离开、留下还是返回,是不少农民需要做出选择的问题。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头上绑着白布的小男孩问。

旁边的爷爷答道:“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门口怎么这么小?”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看着眼前的棺材,爷爷深深地叹了口气。

2012年,焦波的团队进驻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拍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村里一个叫张自军的年轻人到贵州打工,从8米高的架子上摔下来后不治身亡。骨灰下葬当天,做爷爷的就以这种方式向张自军年幼的孩子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8年多过去了,焦波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强忍着情绪才拍了下去。”

“咱们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一件要命的事。”丧事结束后,杓峪村的“学问人”杜深忠十分感慨。年轻时,他也外出打工,五年时间掉了13颗牙齿,“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

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这个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也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不过在杜深忠看来,农民工中有80%都是被“逼”着出去的。在焦波导演的多部纪录片中,“总比打工强”也是不少农民评判生活状态时说的一句话。

出门在外艰辛,返乡创业也不见得容易。16岁就外出打工的任庆金,为了照顾母亲和单亲女儿,回到老家——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的丁楼村。丁楼村位于鲁西南,过去是靠土地艰难讨生活的贫困山庄。近年来借着农村电商的风口,那里成了全国最大的儿童演出服饰生产基地。

2016年底,该村300户农户中,有280多户开有淘宝网店,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的有40多家,超过500万元的10家。

可任庆金没能赶上好时候。他起步晚,又不太会经营,网店开了没多久就因差评和投诉被封。原本用来做生意的电脑成了他玩游戏、喊麦的工具,女儿的幼儿园学费拖了两个月还没交上。

借钱未果,又数次与母亲争吵后,任庆金一气之下砸了键盘,注销了淘宝店。

挣的钱不够生活,“返乡”只是一件看上去很美的事情。

爱与恨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焦波团队正在云南山区拍摄新的纪录片。受此影响,直到7月下旬,他才返回北京。

“疫情来了,村子封了,摄制组正好在村里待着,一直拍到6月末。”焦波的农村纪录片,拍摄周期大多都以年计算。

杓峪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是苹果。纪录片拍摄那一年,苹果滞销,杜深忠和老伴儿张兆珍用每斤2元3毛5分的价格“贱卖”掉苹果后,在家请来帮忙的同村人吃饭,那是杜深忠在整部纪录片中唯一一次喝酒。

“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借着酒劲,杜深忠激动地说。

“我下去维持不了生活。”

“别人下去都能找活干,你们下去不能找活干?”

“下去我活不长了,最多再活两三年。”

“下去怎么可能活不长久?你不要动不动就说话不长久。”

“你这是把我逼上梁山了。”

又一次因为搬不搬迁的问题产生争吵后,申家父子矛盾激化,差一点大打出手。大漆村党总支书记申修军闻讯前去调解,“因为移民搬迁,要

变与不变

“我下去维持不了生活。”

“别人下去都能找活干,你们下去不能找活干?”

“下去我活不长了,最多再活两三年。”

“下去怎么可能活不长久?你不要动不动就说话不长久。”

“你这是把我逼上梁山了。”

又一次因为搬不搬迁的问题产生争吵后,申家父子矛盾激化,差一点大打出手。大漆村党总支书记申修军闻讯前去调解,“因为移民搬迁,要